

季进 余夏云 / 著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综论



Series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n
Chinese
Cultur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余夏云 / 著

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综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论 / 季进, 余夏云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8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28572-5

I. ①英… II. ①季… ②余…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英语—文学翻译—研究 IV. ①I206.6 ②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84866 号

- 书 名 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论
Yingyu Shijie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Yanjiu Zonglun
- 著作责任者 季 进 余夏云 著
- 责任编辑 朱房煦 张 冰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8572-5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ku.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子信箱 zhufangxu@pup.cn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4382
-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8 印张 352 千字
-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6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总 序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并且是唯一流传至今仍生机勃勃的文明。中华文化不仅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一以贯之的发展系统,而且长期以来以其高度的文化发展影响着周边的文化。从秦至清两千年间,中国始终是亚洲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中华文明强烈地影响着东亚国家。在19世纪以前,以中国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包括中国、日本、朝鲜、越南在内的中华文化圈。由此,中华文化圈成为与基督教文化圈、东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和印度文化圈共存的世界五大文化圈之一。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丛书”的主旨就是探索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的传播与影响,对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中国文化研究给予学术的观照: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背景下追踪中国文化典籍外传的历史与轨迹,梳理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的历史、人物和各种译本,研究各国汉学(中国学)发展与变迁的历史,并通过对各国重要的汉学家、汉学名著的翻译和研究,勾勒出世界主要国家汉学(中国学)的发展史。

严绍璁先生在谈到近三十年来的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意义时说:“对中国学术界来说,国际中国学(汉学)正在成为一门引人注目的学术。它意味着我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认识愈来愈深入;也意味着我国学术界愈来愈多的人士开始认识到,中国文化作为世界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对它的研究,事实上具有世界性。——或许可以说,这是二十年来我国人文科学的学术观念的最重要的转变与最重大的提升的标志。”^①就是说,对中国人

^① 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5期,第6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年。

文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中国本土,而应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对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中国文化研究给予观照,打通中外,揭示中国文化的普世性价值和意义,这是本丛书的思想追求。

从知识论上来说,各国的汉学家在许多具体学科的研究上颇有建树,我们只要提一下以伯希和所代表的欧洲汉学家对西域和敦煌的研究就可以知道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推进中国文化研究的价值,这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因此,对域外汉学家所做的中国文化研究的成果,应予以一种实事求是的尊重。中国文化已经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因此,在不少中国文化研究的具体门类和学科上,在知识论的研究方面,最好的学者并不一定在中国,他们可能是日本人、法国人、德国人等等。因此,系统地梳理各国的中国文化研究历史,如上面所讲的展开对域外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流派、人物的研究,是本丛书的基本学术追求。

但域外的中国文化研究毕竟发生在域外,对其的把握仅仅从知识论的角度加以认识仍显不够,我们应注意把握这些发生在海外的中国文化研究所采取的方法论,注意从跨文化的角度,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加以把握和理解。注意其方法论,注意其新的学术视角,运用比较文化的研究方法,揭示出隐藏在其“客观知识”背后的方法论,这正是我们展开国际中国文化研究者的基本任务。

同时,注意“影响史”的研究。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和影响是两个相互关联而又有所区别的领域。一般而论,传播史侧重于汉学(中国学),即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域外的中国形象首先是通过他们的研究和介绍才初步建立的;影响史或者说接受史则已经突破学术的侧面,因为国外的中国文化研究在许多国家仍是一个很偏僻的学科,它基本处在主流学术之外,或者处于学术的边缘,中国文化在域外的影响和接受主要表现在主流的思想和文化界。但二者也很难截然分开,因为一旦中国文化的典籍被翻译成不同语言的文本,所在国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就可以阅读,就可以研究,他们

不一定是汉学家,但同样可以做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他们对中国的兴趣可能不低于汉学家,特别是在创造自己的理论时。接受史和影响史也应成为我们从事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在这个意义上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是我们对国际中国文化展开研究时的基本方法。

实际上汉学(中国学)的引入具有双向的意义,它不仅使学术转型中的中国本土学术界有了一个参考系,并为我们从旧的学术“范式”中走出,达到一种新的学术创新提供了一个思路,同时也对国外的中国文化研究者们,对那些在京都、巴黎、哈佛的汉学家(中国学家)们提出了挑战,正像中国的学者必须认真地面对海外汉学(中国学)家的研究一样,他们也应该开始听听中国同行的意见。任继愈先生在世主编《国际汉学》时曾提出过,要通过正常的批评,纠正那种仿佛只要洋人讲的就没错的“殖民思想”,把对汉学(中国学)的引进和学术的批评统一起来,在一种平等的对话中商讨和研究,这才是一种正确的学术态度。对国外中国文化的研究成果也不可盲从,正像对待所有的学术成果都不应盲从一样。这样讲,并不是否认这些汉学家在学术上的贡献,而是现在海外的汉学家们必须考虑到他们的著作如何面对中国读者,因为一旦他们的书被翻译成中文,他们的书就会成为中国本土学者的阅读、审视和批评的对象。对于那些做中国的学问而又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上的汉学家来说,现在已经到了他们开始反思自己学术立场的时候了。而那些居高临下,对中国的学术指东道西,以教师爷身份出现的汉学家则可以退场了。

当我们面对大量涌进的国外中国文化研究的成果,一方面,我们应有一种开放的心态,有一种多元的学术态度,不能有那种“画地为牢”,对汉学家研究的成果视而不见的态度。同时,也应考虑到这是在另一种学术传统中的“学问”,它有特有的文化和学术背景,不能拿来就用,要做比较文化的批判性研究。随着汉学(中国学)的不断引入,对汉学著作做一种批判性研究和介绍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因为在不同学术传统中的概念和方法的转化和使用必须经过严格的学术批判和反思才行。如何立足中国本土的学问,借鉴汉学的域外成果,从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创造出新的理论,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追求所在。

中国是汉学的故乡,对中国文化的学术研究中国学者自然有着国外学者不可替代的优势。在世界范围展开中国文化的研究开阔了我们的学术和文化视野,促进了我们观念和学术的发展,引进域外中国文化研究的成果是为了我们自身学术和文化的变革与发展,万不可在介绍西方汉学(中国学)走马灯似的各类新理论、新方法时,我们自己看花了眼,真成了西方的东方主义的一个陪衬,失去了自己的话语和反思的能力。因此,立足中国文化的立场,会通中外,打通古今,通过对域外的中国文化研究做建设性的学术对话,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和文化的重建,这不仅成为本丛书的主要内容,也成为我们展开这一学术活动的根本目的。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在对域外中国文化研究的称谓上仍无法完全统一,“汉学”或“中国学”都有其自身的逻辑和思路。为兼顾各方的学术立场,本丛书定名为“国际中国文化研究丛书”。我们将海纳百川,欢迎海内外的中国文化研究者为我们撰稿,或译,或著,我们都衷心地欢迎。

张西平

2017年5月27日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理论”语言(代序)

李欧梵

我本来不打算为这本书写序,原因很明显,书中讨论了我的学术著作,我的作品既然成了研究的对象,就不能够再“说三道四”了。何况我本来就是这个英语世界学术圈里的人,只不过因为提早退休,离开美国学府到香港任教,所以目前我似乎处于英文和华语这两个世界的边缘。这篇小序,是在季进教授再三催促之下,才勉为其难而写的,也是从这个边缘视角,用一种自我反省的态度而写的。

当初季进向我提起,想要研究美国的汉学——特别是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情况,问我的意见,我颇为犹豫,这有什么好研究的呢?然而他提醒我,对于中国的学者而言,海外汉学是绝对值得借鉴的,至少它提出了不少新的话题、方法和理论,值得闭塞已久的国内同行参照。我一向主张学术无国界,只有语言的隔阂,应该多鼓励互相交流,最好超越国界,就像我心爱的古典音乐一样。我被他说服了。如今读这本书,真是获益良多,值得向各位同行和读者推荐。

这本书总览半个多世纪——约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到21世纪初十年——英语世界(以美国为主)的学者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包括近代和当代)的研究,几乎把所有的重要著作涵盖。季进和他的得意门生余夏云下了极大的工夫,使得这本书成为至今为止海外汉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我要特别指出,两位作者的评论观

点(见本书“绪论”)客观而持平,对各个学者的不同学术观点都采取兼容并包的同情态度,也不忘把这些著作分门别类,放在一个整体的诠释框架之中。这个诠释框架是季进多年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教学和编辑工作所得来的成果。更难能可贵的是书中所用的语言,虽然充满了理论性的名词和用语,但读来都相当清楚,不难理解,这也是一大成就(但仍然引起我的反思)。由于我自己的著作被包含在内,所以我对于本书各章节的详细内容就不做评论了。在此只想谈谈我自己的一点反思,即有关西方理论语言“挪用”到中文语境后所产生的问题,说不定和本书所观照的主题有点间接关系。在反思的过程中,我也附带把自己在美国学界的教学和研究经验拉进来,因此要声明,这篇前言只代表我个人的感想,不是严格的书评。

—

在美国的汉学界,本来没有现代文学这个学科,也没有专授现代文学的教授。在传统汉学的领域之中,中国文学指的就是古典的诗词,甚至戏曲和明清小说都是稍后才加上去的。夏志清教授的大著《中国现代小说史》初版于1961年,可谓为英语世界现代文学的研究奠定一个基础,然而夏先生受聘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教的课程却不只现代文学,也包括古典小说和元杂剧。我自己在哈佛所接受的训练是历史,后来不自觉地“跨界”到现代文学的领域,纯属个人的爱好和导师的“纵容”,在拙著《我的哈佛岁月》中已经叙述得很多。20世纪70年代末,正是我个人在学术生涯上的失落时期,被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解雇以后,不知何去何从。侥幸得到印第安纳大学东亚语文学系的教职,这才发奋把现代文学的研究作为专业,遂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商大计,在印第安纳大学出

版社支持下,一连出版了一系列的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的英译本,也附带出版“中国文学与社会的研究”书系。这才为这个新的学术领域打下一个初步的基础。

美国学界当年很注重“field”,也就是专业领域,“跨学科”的说法并不流行。然而,这个中国现代文学的专业如何定位?这也要经过时间的考验。第一批进入这个专业的学者,大多不是专门研究文学的人,只有少数受过比较文学训练的学者,如刘绍铭,他也是夏氏兄弟的大弟子和我的好友,为这个专业贡献良多。他不但组织班子把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翻译成中文(出版于1979年),而且也为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编辑了两三本中国现代小说的选集。没有这类教科书,我们在美国根本无法上课。如今在美国各主要大学的东亚系,都有中国现代文学的专职教授,而且变成最能够吸引学生的热门学科。加以近年来对于视觉媒体,特别是电影的研究,突飞猛进,现代文学和电影也合为一体,变成一个跨学科的专业。然而,任何一个新的学科,在初发迹的时期,必须要不断地“证明”它的重要性与“合法性”,因为它本来没有学术上的传统,所以要为自己在学术上求得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位置,而不再受以古典为主的汉学界的偏见和鄙视。这一段筚路蓝缕的早期历史,新一代的学者(内中不少是来自中国、在美国受过正统比较文学和理论训练的佼佼者)可能早已遗忘了。

本书“绪论”的总标题是“海外汉学与学术共同体的建构”,言下之意似乎已经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为海外汉学的一部分,其实不然。我们如果记得这一段历史的话,也许可以对这个学科后来的“理论转向”进一步了解,因为这个学科的成熟,是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兴起同步的。这一个新的学科,几乎把文学、视觉媒体、性别、种族等议题合在一起,并以源自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理论”(Critical Theory)为其理论基础,但很快地就扩展到

法国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新一波的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理论的范畴。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者不能像传统汉学一样闭关自守，其背后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学院的现当代中国的研究，本属于“地区研究”（Area Studies）的一部分，而后者却是冷战时期设立的研究项目，所谓中国专家“China Expert”或“China Watcher”，即是指此，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如今时过境迁，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有学界人士提倡废除“地区研究”，因为它没有专业学术训练的基础，如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所以在严格的专业学科上站不住脚。因此，地区研究的学者需要在另一个专业中找到栖身之处。这个现象在社会科学方面最为明显，譬如不少研究当代中国经济的专家，也必须得到经济系的认可。那么中国文学呢？古典文学的教授有的也在比较文学系授课，如哈佛的宇文所安教授；有的则置之不理。现代文学不可能自闭，所以很快地就和“文化研究”挂上钩，开始了“理论转向”。

我个人20世纪8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时，也做了一点“理论转向”，然而转得不够全面，因为我至今对于西方文化理论的“适用性”有所保留，因此我对理论的态度也十分暧昧。当时没有想到，“文化研究”这个新的学科（一开始就是一个“跨学科”）如今几乎已凌驾文学本身的研究了，经过各种理论的洗礼以后，它已经从一种“方法”变成一个学科和学系了。换言之，就是另一个专业。而文化研究的趋势一向紧跟当代，21世纪的世界变化越来越快，如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潮流席卷世界各地，学术界也难免受到影响，因此“文化研究”这个学科本身也要跟着转型，变得越来越“当代化”，几乎不理任何历史传统。甚至有人认为“后现代”的理论本身已经过时，被各种全球化的理论取代。生活在变化日新月异的此时此刻，不少人文学科的学者已经再度转向，他们认为由于电脑和网络科技的发展，传统的人文学科都要作废了，“人文”的理论论

述被“去人化”之后,只有变成“后人文”了,因为我们已经进入所谓“后人类”(post-human)的世界。据闻美国理论界的名学者米勒(J. Hillis Miller)在中国演讲时已经提出“Digital Humanities”(数码人文)这个新学科的名字。其理论内容有待探讨。

二

这些新的世界潮流,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究竟有何影响?我至今很难肯定。本书的“结语”提出“世界文学语境下的海外汉学研究”的问题,很有前瞻性。然而到底“世界文学”的发展会如何?目前言之尚早。我认为它显然是传统西方比较文学的扩展和再生,特别看重翻译和传播的重要性,而文学文本和原来的写作语言的地位又如何?这也是在华文语境生长和受教育、从没有出洋留学的学者的焦虑:如果一切都经过翻译的话,中文著作的终极价值又何在?是否比得上翻译过来的海外汉学?对于有双语基础的学者,如果学术诠释的主流语言完全变成英文的话,又何必用中文写作呢?我在台湾和香港屡次听到中文系研究生的困惑:“老师,我们学习中国文学,必须套用西方理论吗?”这个困惑的背后隐含了两个大问题,一个是中国文学和语言的“主体性”何在?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为什么理论都是西方来的,难道中国文学就没有自己的理论吗?

我个人永远徘徊在中西两个语境和两种学院文化之中。我同情第一个立场,因为我认为在如今“全球化”的潮流影响之下,反而加重了西方学术的地位和其专业语言,而用中文写出来的学术论著却被视为“二等货”。目前香港各大学竞相提倡用英语教学和写作,甚至连中国文学也要用英文教。既然要“国际化”,为什么不可以中西并用,一视同仁?这个“国际化”的压力,使得亚洲各地的华

人学者(不只是中国)不知所从,于是竞相“媚外”,忘记了自己文化本身的资源。中国现代文学也有它自己的学术传统,我认为这种学术传统是在民国时代,也就是从五四新文化时期开始建立的,但没有完成。近年来王德威教授关于中国美学的抒情传统和它与现代的相关性,就是从这个方向有感而发的。

最近我开始对民国时代的学术史产生浓厚的兴趣,这才发现我们这一代留过洋的学者对于外语的掌握,比他们那一代差远了!随便举几个例子:众所周知,鲁迅懂日文和德文,然而他讲中国小说史的时候,并没有用日本或德国的理论系统。胡适大谈科学的方法,但研究中国小说依然用考证,原来考证是五四时期“整理国故”的显学,而不是欧洲的汉学,其实欧洲汉学的传统也奠基在语言——特别是古代语言——的掌握。以介绍西方理论出名的朱光潜、梁宗岱、宗白华等人,更不用提钱锺书,他们不但精通外语,而且在自己的理论文章中处处不忘和中国传统比较。在比较文学这个学科尚未在中国建立之前,他们已经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探讨了。如今比较文学在英美式微,似乎被世界文学取代,我们是否应该反省一下:中国现代文学本身的学术系谱何在?五四时期的作家和学者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我们如何处理?又如何与当代英语世界的理论“接枝”?在民国时代没有现代文学这个学科,也没有专门研究“现代性”的理论,只有“现代”这个名词,施蛰存编的《现代》杂志的外文名称是“Les Contemporains”,现代就是当代,几乎是同义词。因为那个时候还处于“现代”,还没有“后现代”这个名词。当时也有各种西方理论(包括伯格森和克罗齐的理论),那一代人对于同时代和以前的西方理论都是以开放的心态接受的,用以建立新的学术典范,但没有随意套用到中国文学上面。即使是王国维受叔本华的启发而研究《红楼梦》,并没有把叔本华的理论强压在他深厚的国学根基上面。我读他们的视野广博又深入浅出

的学术著作,不禁慨叹: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出不了什么大师了。

中国现代文学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古今中外兼容并包的学科,因此我一向也主张,这个领域的学者个个都背了一个十字架:纵向的一轴指向传统,横向的一轴指向西方,我们是在这双重“影响的焦虑”下做学问。我自觉学问不足,该学的东西太多了。只从横向看去,我们对于西方文学理论本身的传统,到底掌握得够了吗?记得在哈佛我和季进闲聊的时候,偶尔提到我在20世纪60年代初到美国的时候对于西方理论的兴趣,当时我把理论和文学文本混在一起读,特别是存在主义的大师萨特和加缪的小说和散文,也读其他学者研究存在主义的书,不分青红皂白。当年的主流文学理论是“新批评”,我反而没有什么兴趣,因为它不讲作品的文化背景和作者生平。后来我读了几位讨论欧洲文化和文学(包括理论)的著作,包括乔治·斯坦纳的《语言与沉默》,大为倾倒。这是一本散文集,文笔典雅之至,字里行间洋溢着人文精神。原来我喜欢的批评家,个个都是人文主义者,他们写的散文式的批评,把批评和理论合二为一,文体(style)都特别出色。在学界领军的理论人物是耶鲁的René Wellek和哈佛的Harry Levin,还有纽约的那批公共知识分子,如哥伦比亚大学的Lionel Trilling和Jacques Barzun,当然还有稍后的Susan Sontag,我读他/她们的著作,对内容一知半解,却对他们的文笔,深感佩服。常年住在普林斯顿的Edmund Wilson,虽然早已退休,但影响力仍然很大。这些人物身跨学院内外,时常在知识性的文学杂志发表文章,并非只写学术论文在学术期刊登载。他们的文学批评,也可算是文学理论,为后一代学界的“反叛”铺路,我们不能不知道这个背景。没有想到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季进后来竟然把这些早期理论大师的著作汇集起来,编了一套《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介绍给了中文世界,真是功莫大焉。

我研究西方理论,非但把(好的)理论当作文学文本来读,而且

必要时又要把理论本身和“应用”完全分开。当我读本雅明的文章的时候,往往把它作为文化批评的散文或杂文来读,感受他对于当代欧洲文化的敏感,根本忘记“挪用”,虽然在拙著《上海摩登》的最后一章提到他的“都市漫游者”的理论,但不敢全盘照搬。后来对他的文章越来越感兴趣,早已忘了把他和中国文学研究拉上关系。有时候,读他的《柏林童年》会想到我自己的童年,文化之间的差异何止千里!后来读他的名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只“幻想”他的德文文体是什么样子,最近在德国终于买到一本德文版,却因自己学习德文的资历太浅,不得其门而入。我从这个经验中所取得的教训是:好的理论本身就值得细读,像一本文学名著一样;坏的理论往往是二手的演绎,不值得花大功夫读,浏览一下就够了。随意套用理论,反而对理论不够尊敬。各种理论本身也有它自己的系谱,有时我把它当做思想史或文化史来读。总而言之,我不是为了挪用才来读理论,而是纯为了欣赏其本身思想的奥妙和它的文体语言。

在美国长期用英文写作,我发现自己的中文文笔似乎退步了。回港以后,我故意不停地用中文写半学术性的评论文章,但随时也感觉到英文在背后作祟。如果用中文写学术文章,反而没有写英文时那么执着,必须用最适当的词语。这也使我领悟到:原来学术论文和杂文的文体是两码子的事。但区别究竟在哪里?是否一定要用理论性的语言才算学术文章?我回顾民国时代的学术语言,大多有散文色彩,读来并不深奥。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很多是活跃在学院内外的“两栖动物”,但似乎有一种自觉,希望把自己的学术传给更广泛的大众,而限于专业学子,这也是一种五四的精神。学院专业化,和学院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一样,是一个“现代化”的副产品。长此以往,真正的知识传播的前景堪忧。一个更值得忧虑的现象是:学术论文的文体变成一种规格,徒具形式的空架

子,在一大堆套用的西方理论术语笼罩下,内容反而显得空洞,甚至乏善可陈,更不必提作者的文笔,因为每个人写的句子都差不多,读来枯燥乏味,有时更不知所云。我认为这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人文精神危机,除非你认为今日已无人文精神可言。

三

语言的运用,对于学者来说不是一件小事,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就内容而言,有时候文笔和内容也大有关系。本书的绪论中谈到“想象的学术共同体”的观念,学术语言是否也是构成这个“共同体”的因素?什么样的文笔会写出什么内容的论文?倒过来说也可以,什么样的内容需要什么样的文笔?这个问题,记得多年前美国学界的一个杂志曾经出专号讨论过,时当 Hayden White 的那本《元历史》(*Meta-History*) 刚刚出版的年代(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说不定就是他自己提出来的。

我觉得自己在用英文写作的时候,心目中隐隐存在一个虚构的“读者共同体”,他/她们可能是同行,也更可能是不懂中文的美国学者和读者,而不是清一色的华人。我用中文写作,就没有这个感觉和想象。那么,把西方理论的语言放进中文语境的时候,是否产生内容和形式上的“质”的改变?是否要顾及到一个读者的“想象共同体”? (为什么要用“共同体”这个较抽象的名词来翻译“community”,而不用“群体”或“社群”? 是否有理论上的根据?)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只能提出来,立此存照。我甚至有种感觉:如果写学术文章不用点高深的抽象名词,学院读者就会瞧不起我的学问。可惜事与愿违,我就是写不出这种理论性强的文章,也许是多年来写文化批评的杂文写惯了,改不回来了。怎么办?

这让我不禁想到季进和余夏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所面临的困

难:如何把一些海外学者的“理论挂帅”的著作介绍得很清楚,使得只懂中文的读者了解其内容,至少可以使圈内的同行专家看得懂。这是一件费神费事、吃力而不讨好的工作。我在此要特别感谢本书的两位作者,他们的文体读来颇为顺畅,一般中文读者也看得懂,更可贵的是,他们把理论名词的原文和译名,以及外国学者的原名和中文名如数交代列出,这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

然而,不容否认,本书的文字和文体也受到理论语言的影响。它的章节编排的概念大多也是从理论的话题得来的。全书共九章,只有第一章(“文学史的多元重构”)和第六章(“通俗文学的文化政治”),不全被理论笼罩。中国国内学者最熟悉的是文学史,然而,海外学者写的“文学史”并不企图全面,也不是教科书。“通俗文学”的研究方法,中外也有差异。季进任教的苏州大学,在范伯群教授率领下,本是通俗文学的大本营,然而他们的学术理想是否和西方理论中所谓的“政治”一模一样?有待商榷。(顺便在此一提,我用“商榷”这个字眼,看来很“传统”,和目前的理论语言中常用的“negotiation”,不见得是一回事,也不知道谁把这个英文字译成“协商”,在平常中文语境,像是外交辞令。)第二章的标题“回旋的现代性追寻”,仿佛出自我的一本书名,看来我也是创用这个名词的始作俑者之一,如今“现代性”这个名词已经在美、中学界泛滥成灾了,什么书都挂一个“现代性”的名字,反而把原来的(至少是我心目中的)涵义弄得模糊不清。问题出在中文语境中的这个“性”字,至今我也无可奈何。

其他几章,从“跨性别的话语政治”(第三章)、“诗史的辩证和变奏”(第四章,来自王德威的理论名词),到“自我的呈现与发明”(第五章,“呈现”一字,想系“representation”的中译)、“马克思主义与美学”(第七章)、“跨语际的文化实践”(第八章)和“多元化的视觉文本”(第九章),皆是西方理论引导下的概念,这恰恰证明,英语